

The Chinese Opera Revolution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 Study in the Horizon of 'Macro-History'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

范方俊 著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

范方俊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范方俊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104-03972-3

I. ①大… II. ①范… III. ①戏曲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J8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5600 号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

范方俊 著

责任编辑:曹 敬

封面设计:常 春

责任印制: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樊国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网 址:www.theatrebook.cn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5893022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100097)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5.5

字 数:300 千

版 次:2013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3972-3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前 言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清末社会的时代变局 及戏曲改良 / 1

- 一 西学东渐下的清末中国社会的时代变局 / 1
- 二 “大历史观”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视野 / 8
- 三 跨文化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清末戏曲改良 / 19

上 编 清末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与 “戏曲改良”的提出

第一章 清末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文学革命”的 提出 / 37

第一节 “近代”何谓以及划定“近代”的标准 / 37

- 一、“近代”在中西词源学上的分野及“古代—中古—近代”的三段论在西方语境中的时间意识 / 37
- 二、西方社会历史划段中的“古代—中世纪—近代”三段论模式 / 40
- 三、划定“古代—中世纪—近代”时代分段的标准 / 43

第二节 清末中国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内在根源 / 49

- 一、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 / 49
- 二、西方近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状况 / 53

第三节 清末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下的“文学革命”的提出 / 57

- 一、十九世纪中后叶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 57

二、近代“文学革命”的提出 / 64

第二章 “诗界革命”：以真精神熔铸新意境 / 69

**第一节 诗文体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及十九世纪中叶
“革新诗歌”的先声 / 69**

- 一、诗文体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 / 69
- 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言志”说 / 73
- 三、龚自珍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革新诗歌” / 80

第二节 “诗界革命”：以新精神熔铸新意境 / 91

- 一、“诗界革命”的前后分期 / 91
- 二、“诗界革命”的宗旨：用“新精神”熔铸“新意境” / 94

**第三节 王国维的新“意境论”与“诗界革命”的“新精神熔
铸新意境” / 99**

- 一、意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发展线索 / 101
- 二、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意境论”的改造 / 103
- 三、王国维《人间词话》“意境论”批评对于西洋诗学学术
范式及新学语的吸纳 / 105

第三章 “文界革命”：以“新文思”开创“新文体” / 114

第一节 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传统及“文界革命”的提出 / 114

- 一、中国传统文学的“诗文相杂”观念 / 114
-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以载道”传统 / 118

第二节 “文界革命”的宗旨：以“新文思”开创“新文体” / 128

- 一、“文界革命”的提出 / 128
- 二、“文界革命”的“新文思” / 138
- 三、“文界革命”的“新文体” / 150



第四章 “小说界革命”：用新观念缔造“新小说” /162

第一节 “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变及清末小说繁荣的原因/162

- 一、“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变 / 162
- 二、清末小说繁荣的原因 / 166

第二节 “小说界革命”之宗旨：以新观念再造新小说/170

- 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观念 / 170
- 二、引外来新思想熔铸中国国民意识 / 175

第三节 “小说界革命”与清末小说创作的实绩/180

- 一、“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 181
- 二、清末“谴责小说”兴起、繁荣的原因及其所受的“小说” / 183

第五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清末“戏曲改良”的宗旨与途径/187

第一节 戏曲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特殊定位及清末“戏曲改良”的提出/ 187

- 一、戏曲的缘起及早期流变 / 188
- 二、戏曲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及“戏曲改良”的必要性 / 191

第二节 “以新思想移植于本国”：清末“戏曲改良”的提出及宗旨/196

- 一、“戏曲改良”的目的 / 196
- 二、“戏曲改良”的核心思想 / 200

第三节 “别求新声于异邦”：清末“戏曲改良”的具体路径/205

- 一、师法莎士比亚等英国文豪开中国戏曲改良之先风 / 205
- 二、师法伏尔泰等法国思哲开中国戏曲改良之道路 / 208

下 编 清末“戏曲改良”的理论 主张及主要内容

第六章 清末“戏曲改良”的理论主张/216

第一节 欧榘甲《观戏记》论粤剧改良及对清末“戏曲改良”的 示范意义/217

- 一、欧榘甲写作《观戏记》的缘起/217
- 二、欧榘甲《观戏记》论粤剧改良/221

第二节 陈独秀《论戏曲》的戏曲改良主张/226

- 一、陈独秀《论戏曲》对于戏曲文体性质的理论界定/226
- 二、陈独秀《论戏曲》对戏曲有益功用的理论说明/228
- 三、陈独秀《论戏曲》对于戏曲改良的具体建议/230

第三节 柳亚子、陈佩忍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对于清末 “戏曲改良”运动的理论宣传与政治鼓动/236

- 一、柳亚子与《〈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237
- 二、陈佩忍与《论戏剧之有益》/240

第七章 清末“戏曲改良”的戏剧创作/246

第一节 清末“戏曲改良”中的戏曲创作剧目/246

- 一、清末“戏曲改良”中的传奇曲目/246
- 二、清末“戏曲改良”中的杂剧剧目/251
- 三、清末“戏曲改良”中的地方戏剧目/255

第二节 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的时代内容和进步意义/260

- 一、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中国历史英雄人物的颂扬/260
- 二、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先
驱的讴歌/262



三、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西方列强凌辱中国的控诉/264

四、清末“戏曲改良”的戏曲创作对于妇女解放的提倡/268

第三节 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引入“西法”的改良尝试/270

一、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对于异域戏剧题材的引入/270

二、清末“戏曲改良”在戏曲创作上对于西洋戏剧写作技法的引入/273

第八章 清末“戏曲改良”的舞台实践/279

第一节 汪笑侬与“时装新戏”改良/280

一、立志改良旧戏的“伶圣”：汪笑侬的传奇戏剧人生/280

二、《瓜种兰因》：汪笑侬“时装新戏”的样板/282

三、汪笑侬与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291

第二节 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与上海“新舞台”改良戏剧/295

一、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与上海“新舞台”/295

二、上海“新舞台”的改良新戏《潘烈士投海》/296

三、上海“新舞台”的改良新戏《黑籍冤魂》/299

第三节 清末“戏曲改良”舞台实践对于新剧场、新舞台的改良与创新/304

一、清末“戏曲改良”舞台实践对于新剧场的改良与创新/305

二、清末“戏曲改良”舞台实践对于新舞台的改良与创新/308

第九章 清末“戏曲改良”对外国戏剧的译介/313

第一节 林纾对于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的翻译/313

一、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及时代意义/314

二、林纾《吟边燕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初衷/323

三、林纾《吟边燕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具体内容/325

第二节 王国维对于德国近代戏剧的译介/337

一、王国维对于德国戏剧文豪希尔列尔、格代的译介/338

二、王国维对于德国剧作家海别尔的译介/342

第三节 清末“戏曲改良”对于外国戏剧作品的翻译/347

- 一、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中所翻译的有代表性的外国戏剧作品/347
- 二、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中翻译外国戏剧作品的意义/353

结 语 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及二十世纪中国 “新戏”的历史性出场/361

- 一、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361
- 二、“春柳社”的成立及其戏剧改良主张与清末“戏曲改良”
之间的关系/371
- 三、“春柳社”《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的公演：二十世纪中国“新戏”的
新声初啼/382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393

- 一、戏曲作品及史料汇编/393
- 二、中外论著/395
- 三、报刊杂志与论文/397

后 记/398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清末社会的 时代变局及戏曲改良

从时间上讲，中国清末所处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的文明冲撞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和西方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折期。对于西方社会而言，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确立，以及由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在实现自身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同时，其对非西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① 而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伴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强势文明对于中华古老文明的压倒性胜利，中国清末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大外力的压迫下，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同样面临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形态向近现代形态的社会转型。“文变染乎世情”，清末的戏曲改良正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各自都发生社会转型又相互发生激烈碰撞的特定历史情境下出现的。因此，清末“戏曲改良”是近现代中西文明碰撞、融合下的时代产物，从始至终都带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西学东渐下的清末中国社会的时代变局

德国二十世纪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

^① 在西方学界，西方资本主义对于全球的最强控制力的时间点被公认是 1900 年前后，也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具体可参阅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



中，用“文化轴心”的概念，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中东和古代希腊看作是世界文明的几个原创型源点：

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 200 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时，我们同历史的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

最不寻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圣贤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①

不过，尽管雅斯贝斯的“文化轴心说”肯定了包括古代中国文明在内的世界源发文明的原创性和独立性，但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一性和共同性是确信不疑的。其实，从根本上讲，包括古代中国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的几个文化源点，都不是在全然自我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独立实现的，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与外部世界的其他文化产生实质性的接触与交流，并把吸纳、融合外部世界的他者文化，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有益营养和补充。这一点，诚如中国学者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所指出的：对于古代中国而言，东临大海、西为雪山的地理环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代中国人的对外交往，但是并没有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中国古代的文献已有对于外部世界的零星记载，如：《逸周书·王会篇》记载西周武王（一说陈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大戴礼记·甲兵》卢注曰：“殷之夷国，东方十，南方九，西方九，北方十有三。”而《山

① [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8 页。





海经》关于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以及东、南、西、北、内海和大荒东、南、西、北的文字描述，则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的朦胧认知和浪漫想象。进入汉代以后，随着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汉帝国打通了与南亚的印度和欧洲的罗马帝国的交流通道，并从此揭开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密切交往的序幕。^①

中国学者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一书中，以宏大的规模，翔实的史料，分“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蒙元及明”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四个部分，全方位地记述了中国从古代文明发蕴的史前时期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明发生实质碰撞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完整内容，涵盖了“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以及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规模之战斗）”等诸多方面。^② 对于在书中所使用的“中西交通史”的名称，方豪特地做了两点重要的说明：

其一，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古代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主要都是向西展开的，所以，在历史上中国一直习惯地用“西方”去指称与中国发生交往的欧亚大陆诸国，这就造成了中国对于“西方”所指方位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以方位（西）作研究范围，本不妥适。如讲中国与阿拉伯、印度交通史，往往涉及南洋；谈中俄交通史，则又不能避免叙述与北方或东北方及西北方之关系。……（而）中国版图之疆界固随时代不同而有变迁，‘西’字所指，更因历代地理知识之差别、国势之强弱及对外交通之发达与否，而或远或近，漫无标准，陆上如此，海上亦然”；^③ 同时，由于中国自近代以后开始用“西方”来专称欧美诸国。“今日国人习用之‘西’字，盖指欧洲或兼美洲而言。自明末以后，称‘西学’、‘西教’、‘西土’、‘西书’、‘西画’、‘西乐’，乃至‘西医’、‘西药’等等，无不如此。清代中叶以后，震于西力之东渐，几有谈‘西’色变之势，张之洞辈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于是‘中西’二字之连用，乃尤为普遍；但其结果，则大至思想学术，下至生活习俗，无不呈中西合璧或中西混合之象；及五四

① 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418页。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版，第2—3页。

③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版，第2页。



运动以后，乃有东西文化之争，有赞成全盘西化者，有主张发展传统文化而仅加若干外来材料以为补充者。‘西’字的今日习惯用法，至此乃更确定为指欧美而言”。^① 因此，方豪指出，“中西交通史”中的“西”字所指，并非是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业已约定俗成的专指，而是取中国历史上对“西”字所用的广义用法。这里所说的“中西交通史”，其实就是中外交通史。

其二，“交通”二字，是对英文 Relation 或 Intercourse 的中译，强调的是中西之间文化交流的交互性。故而《中西交通史》在详述西方文化东传的同时，也相应地考证了中国文化西传的情况。比如，汉代中国丝绢之大量西销及中国灌溉法之西传，罗马帝国灭亡所受中国之影响，隋唐宋时代中国四大发明印刷、造纸、罗盘及火药的西传，蒙元明代中国算盘传入欧洲及郑和下西洋对南洋诸国的影响，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对中医中药的介绍、中国古代经籍西传对于近代西方哲学和政治的影响，以及中国美术之西传对于欧洲近代罗可可美术趣味的影响等等。

相较而言，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更加关注外来文化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知识、信仰的建构所起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借用地理学上的“板块漂移理论”，形象地说明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所产生的积极文化成果：

地理地质学界有所谓的“板块漂移说”，一个大陆，由于某种力量分成几块，或几块大陆由于互相碰撞挤压成为一块，据说喜马拉雅山脉就是这种碰撞挤压形成的“造山运动”的结果。思想史上的交流也是如此，世界视野的拓展必然引来外来文化交融与冲突，文化交融与冲突则必然导致思想世界的变化。一般说来，在意识形态逐渐完熟、定型与固定化的时代，思想体系的内部就已经不再具有自我更新与引发变异的资源，即便有，更新与变异也只是在思想世界的内部，并不影响整个思想世界的格局。而此时的世界拓展与思想碰撞，就给一个相对封闭的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些外在的，但又是新鲜的变革动力。^②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重印版，第 1—2 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9 页。





在葛兆光看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来文化思想，主要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从汉代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直至明中叶的印度佛学的引入。其具体表征，就是“中国思想世界经过春秋战国的分化到两汉逐渐百川汇海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已经不再有自己的变化更新的内在动力，而正是在这一时刻，佛教东来，成了中国思想世界自我调整的契机，汉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道教的崛起及其对佛教的回应，中国传统思想对佛教不断的融会，以及在这种对固有资源的不断再发现过程中持续地提出新思路”；^①第二个是从明中叶开始，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其具体表征，则是“从明代中后期西洋人进入中国以后，在两三个世纪里，各种西洋新知不断进入中国，并开始缓慢地渗透到中国知识体系中。……使原本自成体系的中国知识世界处在捉襟见肘的被动应付地位，不得不创新考虑自己思想的支持系统”。^②

葛兆光并不否认印度佛学的引入曾对中土文明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他着重指出，在西学东渐之前，从整体上而言，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并不是很大”，而“直到明清两代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逐渐有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中国才……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两百年后，西洋强势与域外新知相互支持，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中随着船坚炮利与商贸往来双管齐下，才真正地深入中国，并在十九世纪末，最终导致了传统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瓦解，”^③并据此把十九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所引发的中国晚清社会的时代变迁形象地比喻为“天崩地裂”。^④

事实上，对于西学东渐所引发的中国晚清社会的时代大变局，清末的一些有识之士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清末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在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的开篇，就从外来文化思想与本土文化思想的互动入手，概述了外来文化思想对于中土文化思想的重要影响：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④ 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



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①

王国维对照分析了印度佛学和西洋学术之于中土文化思想的不同性质，直言同为入世性质的西洋文化思想对于中土文化思想的冲击，要远比与中国文化异质的出世性质的印度佛学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大得多，而中国文化在接纳西洋文化思想上的困难，也远非中国六朝、唐宋时期对于印度佛学的“能动调和”可比：

夫西洋思想之入我中国为时无几，诚不能与六朝唐室之于印度较，然西洋之思想与我中国之思想，同为入世间的，非如印度之出世间的思想，为我国古所未有也。且重洋交通，非有身热头痛之险，文字易学，非如佉卢之难也，则我国思想之受动，宜较昔日为易，而顾如上所述者何哉？盖佛教之入中国，帝王奉之，士夫敬之，蚩蚩之氓，膜拜而顶礼之。且唐宋以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统之说未起，学者尚未有入主出奴之见也，故其学易盛，其说易行。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藪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且非常之说，黎民之所惧；难知之道，下士之所笑。此苏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格拉底之所以仰药，婆鲁诺之所以焚身，斯披诺若之所以破门，汗德之所以解职也。其在本国具如此，况乎在风俗文物殊异之国哉！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①

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引入西洋学说只重科学、实利、政治目的而忽视文化思想学术的不良倾向，王国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今置宗教之方面勿论，但论西洋之学术。元时罗马教皇以希腊以所谓七术（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遗世祖，然其书不传。至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遂为国家所采用。然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咸、同以来，上海、天津所译书，大率此类。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议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近三四年，法国十八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之介绍，而入于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然附和此说者，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彼等于自然主义之根本思想，固懵无所知，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由学术之方面观之，谓之无价值可也。……

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褻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汗德《伦理学》之格言曰：“当视人人为一目的，不可视为手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9页。



段。”岂特人之对人当如是而已乎，对学术亦何独不然。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①

并大声疾呼以能动之精神、开放之胸怀，打破中西门户之见，实现中西文化思想学术的“化合”：

遂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者，此又不然。何则？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具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②

上述见识无疑代表了清末有识之士对于西学东渐下的中国社会时代大变局的清醒认识。

二、“大历史观”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视野

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持续的中西文明大碰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以及过往历史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传统定位。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点评西洋新知的进入对于引发清末中国知识世界的重大变迁时所指出的：“近代中国的自我认识史，实际上与关于‘世界’和‘亚洲’的观念变迁是一体的，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一个作为对等的‘他者’（the other），仿佛缺少一面镜子，无法真正认清自身，在十九世纪，中国是确立了‘世界’与‘亚洲’等‘他者’的时候，才真正开始认清自己，近代中国关于‘世界’

①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7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